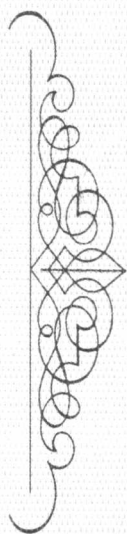


舒芜集



第三卷



河

北

人

民

出

版

社

舒 芜 集

第三卷



1987年10月16日作者在“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”上发言，左为会议主席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。



1993年8月19日摄于北京。右为日本木山英雄教授（周作人研究者）。

说 明

本卷是关于周作人的论文和杂文。曾经出版过系列论文集《周作人的是非功过》，现将该书收入，依该书分为“上编”、“下编”，上编有新增的一篇、又增加了一个“附编”。另有《历史本来是清楚的——周作人出任“华北教育总署督办”伪职的问题》一篇，载《鲁迅研究动态》1987年第1期，未入此卷；程光炜编《周作人评说80年》（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月版）中编入此文。

目 录

上 编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[3] | 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
——周作人概观 |
| [101] | 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阴暗
——周作人的文化心态 |
| [144] | 我思，故我在
——周作人的自我论和宽容论 |
| [153] | 女性的发现
——周作人的妇女论 |
| [218] | 向低处广处看
——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 |
| [246] | 重在思想革命
——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|
| [273] | 中国新文学史的“溯源”
——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
判 |

- [302] 两个鬼的文章
——周作人的散文艺术

下 编

- [369] 鲁迅、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
[422] 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
[441] 鲁迅、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
[452] 鲁迅、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

附 编

- [509] 李景彬作《周作人评析》序
[516] 新书版本问题一例
[519] 文章写作时间
[524] 周作人日常生活浪费一例
[527] 周作人攻击“文章作态”之所指
[529] 胡适介绍周作人去燕京大学的时间经过
[534] 不可解
[537] 化己为他
[540] 评《儿童杂事诗图笺释》
[552]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
[562] 知堂少年日记
[569] 八股文与新文学运动
[574] 回忆的力量
[577] 沟通和理解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[583] | 反话文章莫误解 |
| [587] | 误读知堂 |
| [591] | 是疏误？还是讳言？ |
| [596] | 真赏尚存，斯文未坠 |
| [604] | 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 |
| [609] | [附一] 无端的困惑（蔚明） |
| [613] | [附二] 几点说明（舒芜） |
| | 附录 |
| [615] | 关于“周作人现象”的思考
——访舒芜 |

上 编

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

——周作人概观

—

周作人是谁？今天中国青年读者恐怕不少人答不上来；有些人能答出一点，大概也只说得他是鲁迅的弟弟，也是个作家，很不争气，堕落成了汉奸，如此而已。如果告诉他们：周作人在“五四”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，后来虽然暗淡了，但是，左翼作家当中眼光深远的，对他的学问文章仍然给以很高的评价。据周建人回忆，抗战前不久，冯雪峰还表示过这样的意思：“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，鲁迅去世后，他的学识文章，没有人能相比。”^① 后来，

^① 周建人：《鲁迅和周作人》，载《新文学史料》1983年第4期。

抗战爆发，周作人留在沦陷了的北平，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，郭沫若在上海发表了深情怀念周作人的文章，引用古诗“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”，说是只要周作人脱险南来，“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，为了掉换他，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。”^①可是，五个月后周作人就辜负了这些关心，背叛了祖国；而郭沫若当时正是冒险从日本潜回祖国来参加抗战，为爱国青年所敬仰的。今天的青年听到这些情况，恐怕吃惊不小，将信将疑。其实，这都不是太远的事，文艺界八十岁以上的老前辈们，都亲身经历过周作人的名字闪闪发光的时代。

那么，是不是要责怪青年对历史的无知，和极左文艺思想对历史的歪曲呢？当然二者都是事实，但是，还有另一个事实：周作人的确在祖国呼吸存亡之际，背叛了祖国，背叛了受难的人民，这是无可原谅的，不能不受到惩罚的。一代两代青年忘记了他，或者只知道他的罪恶和丑恶，这个惩罚对于他是轻了还是重了，都很难说，反正一切咎由自取，只该他自己负责。人民不可侮，历史不可欺，而历史的无情的规律不一定都是通过人民的明智和公平，有时反而是通过迷乱和偏激，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。

然而，历史又是有情的，公正的，这也常常是一个“曲线中的直线”的进程。近些年来，研究周作人的论著陆续发表了，周作人的历史功绩逐步透露给青年读者了，周作人作品的

^① 郭沫若：《国难声中怀知堂》，载1937年8月30日出版的《逸经、宇宙风、西风·非常时期联合旬刊》第一期，转引自张菊香、张铁荣：《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》，载《南开学报》1983年第2期。

选集也开始公开出版了。大概，一个历史人物如果既有无可原谅的罪，也有不容抹杀的功，那么两方面的账，都会一笔一笔记在历史的大账本上，一时之间可能只有某几页被揭开，另几页被掩住，但是迟早总会一页一页翻开，来一番总清理，哪一笔也漏不掉，错不了。

周作人这一本账，现在看来是可以动手清理的时候了。这是很值得做的。因为周作人的身上，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，不了解周作人，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。鲁迅的存在，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，不了解周作人，也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鲁迅。至于周作人的悲剧，则是和中国文化传统、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有着甚深的联系，不了解周作人，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，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。

周作人这本账又是很不容易算的。它太复杂了，太矛盾了，随便一想就是一大堆的问题。周作人的一生是联贯的，还是截然两段呢？截然两段的事当然不会有，那么，互相联贯的前后两个时期，是非功罪为什么这样相反呢？是前面有假，还是后面有冤呢？是先前侥幸成名，还是后来偶然小误呢？是无可理解无可论证的奇人异事，还是从错误到罪恶、从脱离人民到背叛祖国的完全说得清的发展呢？对于周作人的历史功绩究竟应该怎样估价呢？估高了，会不会同后面一段更加矛盾，更加难以解释呢？会不会减轻了他后来的罪恶，冲淡了人们的义忿呢？估低了，又怎样解释他当时在青年心目中的形象的辉煌，怎样解释在他尚未背叛祖国之前，革命作家们一直还给他以崇高的评价呢？周作人究竟怎样走上背

叛祖国的道路，我们应该怎样来分析呢？怎样在他前段历史里寻找根源，作出科学的说明呢？还有，探讨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？是仅仅具有历史的认识的意义，还是为当前的文学和文化事业继承一份不应该拒绝的遗产，为现实的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呢？

这样一大堆问题（其实还可以举出许多），要想一个一个都解决好，不是短期间做得到的。现在只能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，作一些初步的探索；其实还不是探索问题本身，只是探索一下怎样解决好问题的态度、尺度和角度。

二

究竟怎样来估价周作人的历史功绩，是首先要碰到的问题，或者说是我们今天要研究周作人问题的一个前提。历史上的汉奸有的是，其中也不乏先前有过某种光荣历史的，他们都没有多少好研究的，至少不需要作为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大问题来研究。而周作人问题却是这样的大问题，正因为他在我国新文学新文化史上有过很大的历史功绩，否则这个研究根本就不必要了。

上面说过，一代两代青年忘记了周作人，那是他自取之咎，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对周作人的全盘否定，也未尝不是历史的正义惩罚之曲折的体现。这当然不是说忘掉他的历史功绩就是科学的态度，不过是说这种不科学的态度仍然曲折地体现了历史的正义罢了。今天已经是新的时期，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忿怒很好地结合起来，“以忿火照出

他的战绩”。^①近些年来，有关周作人的研究论著当中，逐渐敢于肯定周作人的历史功绩了。这是应该的，也是必然的。但是，有些文章肯定得很犹豫很保留，似乎周作人不过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运动的一名普通参加者而已，这当然不符历史事实。有些论著作了犹豫保留的肯定之后，立刻又加上许多否定，例如说他的立场还是自由资产阶级的，世界观还是个人主义的，理论武器还是人道主义的，等等，说这些就是他终于堕落的根源。姑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完全准确，即如所说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，思想属于这一套体系的人还多得很，他们绝大多数后来都随着时代而进步过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的老作家，从来密切追随周作人，同样留在沦陷了的北平，与周作人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，但并没有追随他陷入叛国的泥沼，以后也是随着时代而进步，直到而今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可见这些抑扬之论，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而且也没有绕开问题，其用心自有不得已之处，大家都会理解，但是显然不是今天所需要的科学态度。

现在需要的是，对周作人先前的历史功绩，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，要肯定个够，不怕承认他在“五四”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，都是当时最高的水平，没有人超过他，没有人能代替他。

关于周作人的多方面的贡献，阿英曾有一个概括的评价：“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干部之一的周作人，在初期，是作为文艺理论家、批评家、以至于介绍世界文学的译家而存在的。他的论文《平民的文学》（1918）、《人的文学》（1918）、《新文学的

^① 借用鲁迅关于刘半农的话，见《且介亭杂文·忆刘半农君》。

要求》(1920),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,对于当时的运动,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。批评方面,《自己的园地》(1922)一辑,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基石,同时也横扫了当时文坛上的反动势力的‘学衡派’批评家的封建思想。《沉沦》《情诗》二评,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,可说是很重要的文献。说到介绍,从最初的《域外小说集》,到《点滴》、《现代小说译丛》、《现代日本小说集》、《玛加尔的梦》、《陀螺》等成册的作品的翻译,是更足以证明他对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,曾经贡献了怎样巨大的力。但是,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,他的努力与发展,却移向另一方面——小品文的写作,这以后周作人的名字,是和‘小品文’不可分离的被记忆在读者们的心里,他的前期的诸姿态,遂为他的‘小品文’的盛名所掩。”^①阿英的概括,很得要领;我们再补充一个方面,即文化思想和文化评论方面,就更完整了,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只有补充了这一方面,其它各方面才贯串得起来,周作人的历史功绩的突出之处才看得清楚。

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提出“思想革命”的口号,文化思想上的问题是他一直看重的。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,介绍外国文学思潮,讲外国文学史,目的都是为了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。他号召青年要学习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怎样接受欧洲文艺思潮的榜样,“这并不是将‘特别国情’做权衡来容纳新思想,乃是将新思潮来批判这特别国情”。^②他提出著名“人

① 阿英:《周作人的小品文》,原载《社会月报》,收入陶明志编:《周作人论》,北新书局1934年12月初版。

② 周作人:《艺术与生活·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》。

的文学”的理论，是为了反对封建的非人的文学。他以大批评家的权威站出来支持郁达夫的《沉沦》和汪静之的情诗，是为了打击伪善的礼教。后来他写出大量的小品文，成就之所以那么高，影响之所以那么大，就因为他善于用小品文来宣传某种文化思想，进行某种文化批判，不管他是在讲草木虫鱼，在论鬼神道佛，在谈东西学问，在评古今文章。他说过：“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，如或偶有可取，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。”^①他这是以思想家自居，也正是事实。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，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，才高出于当时的一般的水平，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。

下面我们比较具体地看一看周作人在各个方面究竟有哪些历史功绩？突出之处何在？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？我们何以不该拒绝？

三

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。一九一八年一月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一号上发表周作人翻译的论文《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》（英国 W. B. Triter 作），这是他在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阵地上的第一次出阵。以后各期常有他的译文。第四卷第五号上，他发表了新文学运动中所作的第一篇论文《读武者小路君所作的一个青年的梦》，仍然是评论外国文学的。其实他从

^① 周作人：《苦口甘口·自序》。

事翻译工作还早得多，他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前，已经译出了三十四篇外国短篇小说，七部中篇小说，广泛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著作。正是在这个底子上，一九一七年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文学史，编出了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讲义，这也是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行动。后来大约直到一九二一年左右，他的写作工作仍以译述为重点，所译的欧洲和日本小说，小诗，散文，分别编为《陀螺》、《冥土旅行》、《狂言十番》、《空大鼓》等集出版，当时都成为广大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和看向外界的窗口。

周作人的翻译工作，首先是一种启蒙工作，用鲁迅《摩罗诗力说》中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求新声于异邦”的工作。古老中国当时的闭塞蒙昧状态是可惊的。周作人自己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，已经渴望冲破这种闭塞和蒙昧，是当时阅读新书籍最多，接受新思潮最早的一类学生。可是他后来回忆当时“所受到的文学的影响，也就只是梁任公的《新小说》里所载的那些，主要是焦尔士威奴的科学小说，以及法国雨果——当时因为用英文读法称为器俄的名字，此外则是林琴南所译的哈葛德等，后来有司各得，其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比较的有点意思。”^① 他所接触到的外国文学还是这样贫乏狭窄，一般读书人的更加孤陋寡闻，可想而知。又过了十来年，“文学革命”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之次年（一九一八），情况仍然没有很大变化，周作人回忆道：“除却一二种节译的小仲马《茶花女遗事》，托尔斯泰《心狱》外，别无世界名著。其次司各得、狄更斯还多，接下去便是高

① 周作人：《知堂回想录》第七三节。